

DOI:10.13288/j.11-2166/r.2025.19.002

中医古籍文献辨伪史略

王居义¹, 吴林纳², 李鸿涛³✉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2.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摘要] 在梳理中医辨伪历史脉络的基础上, 总结各阶段的辨伪成就, 分析辨伪方法的演进特点。中医古籍文献辨伪工作肇始于隋唐, 发展于宋元, 至明清及近现代已较为成熟。宋以前辨伪以零散质疑为主, 两宋金元时期在疑经思潮下已开始综合性地运用辨伪方法; 明清时期, 在辨伪方法、辨伪书目上, 古籍文献辨伪工作都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学读书志》《世补斋医书》《中国医籍考》等最为突出;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兴起, 文献辨伪成为时代学术热点, 以谢观所著《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医籍大辞典》为代表; 当代谢仲墨的《历代医书丛考》为首部且唯一一部辨伪专书, 意义重大, 而其他辨伪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被不断发表。中医古籍文献辨伪应当深入考察、实事求是、谨慎判断, 以期正本清源, 去伪存真。

[关键词] 文献辨伪; 中医古籍; 《历代医书丛考》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言:“一书的公认著者及年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年代, 这书即被称为伪书。”^[1] 文献辨伪在广义上指辨伪书、伪篇、伪事、伪史、伪说、伪本, 狭义上则指辨伪书和伪篇^[2]。中医古籍文献的辨伪主要集中在辨伪书、伪篇、伪说和伪本上。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言:“辨伪工作, 萌芽于战国、秦、汉, 而勃发于唐、宋、元、明, 到了清代濒近于成熟阶段。”^[3] 关于文献辨伪学及辨伪学史的研究较多, 而于中医专科古籍文献的辨伪史研究仅见个别研究者撰文略陈中医伪书国内外之研究现状^[4]。中医古籍文献辨伪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步骤, 是古籍文本走向临床运用的重要手段, 能有效避免误用伪学而产生不良影响。现借鉴文献辨伪的研究成果, 挖掘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辨伪的内容, 梳理自南北朝时期至当代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史, 总结中医古籍文献的辨伪成就及历史演进规律, 为后续研究提供资料与参考。

1 宋以前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

古籍辨伪工作最早可追溯至刘向、刘歆父子的

《别录》《七略》, 言《文子》《风后》《神农》《大禹》等为“依托”之书, 开辨伪先河。

中医古籍文献辨伪最早可见于南朝褚澄《褚氏遗书·辩书》, “曰: ‘《素问》之书成于黄岐, 运气之宗起于《素问》, 将古圣哲妄邪?’ 曰: ‘尼父删经, 三坟犹废; 扁鹊卢出, 虚医遂多, 尚有黄岐之医籍乎? 后书之托名于圣哲也’”^[5], 首言《素问》为托名之书。但《褚氏遗书》一般也被视为宋人托名之作,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曹禾《医学读书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陈邦贤《中国医学人名志》、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等皆持该书为伪书的观点。稍晚于褚澄的陶弘景在整理《神农本草经》时, 从书中郡县的制度、岁首建寅的天文历法等方面指出“此书应与《素问》同类, 但后人多更修饰之尔”^[6]。可见, 当时已具有不自觉的辨伪意识。

《隋书·经籍志》在《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下注“梁有《神枕方》一卷, 疑此即是”^[7], 考辨了书目异名的问题。唐代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言《神农本草经》中“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 出诸药物, 皆由后人所孱, 非本文也。”^[8] 颜之推以郡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4VJXG071)

✉ 通讯作者: newdream1013@163.com

名证《神农本草经》后出，多依赖直观的史实矛盾，缺乏系统性方法支撑。

这一时期，中医古籍文献辨伪工作较为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的方法和自觉，但对托名经典的质疑已见于子学与史学领域。汉代刘向《别录》开依托之书的辨伪先河，南朝褚澄《褚氏遗书》虽被后世定为伪托，但其对《素问》托名的质疑反映了早期医家对文献真实性的朴素关注。

2 两宋金元时期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

2.1 文人经史目录学家辨伪

受刘知几和唐中期以后疑经辨伪思想的影响，北宋庆历年间兴起了疑经思潮，对众多传统经学典籍进行了疑辨。这种疑经思潮在医学文献领域的辨伪主要集中在《素问》《神农本草经》二书。如《素问》一书，邵雍《皇极经世书》认为是七国时书；司马光《与范景仁第四书》认为是周、汉时期医家托名之作；程颐、程颢《二程粹言》则认为成书于战国。北宋嘉祐年间林亿等校正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指出七篇大论为王冰补入，并考证出《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二篇下文合称《素问遗篇》）为王冰之后的伪作。《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是笔者所见最早开展辨中医古籍伪篇的著作。如《神农本草经》一书，掌禹锡《嘉祐补注本草》叙录言其非神农所作，乃“师学相传”形成的文字，又得两汉名医“附以新说，通为编述”而成。

除《素问》《神农本草经》二部经典著作外，自北宋起，医、儒群体还较多关注《王叔和脉诀》（下文简称《脉诀》）一书。《脉诀》一书约成书于北宋熙宁元年至元祐五年，为宋人高阳生托名王叔和而作^[9]。据马继兴考证，《脉诀》一书约在唐代已有雏形，敦煌卷子《青乌子脉诀》即为《脉诀》中《左右手诊脉歌》全文^[10]。《脉诀》一书在当时流传极广，影响较大，北宋刘元宾更是作《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出现“《脉诀》出而《脉经》隐”“引《诀》而罪《经》”的情形^[11]。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一》首次对该书进行辨伪，并明确指出“六朝有高阳生者，剽窃作歌诀”（作者按：方春阳认为“六朝”为“本朝”之误）。南宋朱熹《伤寒补亡论跋》亦言“词最鄙浅，非叔和本书”。王好古《汤液本草》、戴启宗《脉诀刊误》等医著皆从此论。

南宋晁公武所著《郡斋读书志》，收录书籍

1 400 余种，是现存最早全面开展辨伪工作的目录学著作。该书共收录医书 56 部^[12]，辨为伪书的有 5 部，分别为《素问》《灵枢》《脉诀》《神农本草经》《子午经》，其中《子午经》为晁公武首辨。晁公武认为《素问》《子午经》为后人依托黄帝和扁鹊而成，《灵枢》为“好事者于皇甫谧《内经》《仓公论》中抄出”^{[13] 703}。对于《神农本草经》的辨伪，晁公武主要从历代目录的著录情况和郡县制度两点进行考察。于《脉诀》一书，引唐代甘伯宗《名医传》，认为王叔和“博通经方，精意诊处，尤好著述”^{[13] 710}，而《脉诀》“皆歌诀浅陋之言”^{[13] 710}，故辨其为伪；但晁公武也较早地认识到伪书的价值，即伪书不等同于伪学，称该书“然最行于世”，肯定了其医学价值。赵希弁重刊整理晁公武之书，仿其体例而撰成的《读书附志》进一步指出《脉诀》为依托之作。

晁公武之后，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是首次以“解題”命名的叙录体书目，辨伪书九十余部^[14]，其中医书有《素问》《脉诀》和《中藏经》，《中藏经》为其首疑为伪书。陈振孙从文辞鄙俗疑《脉诀》非王叔和所作，从作者身份疑《中藏经》非华佗所作，而言《素问》“固出于后世依托，要是医书之祖也”^[15]，亦肯定了伪书的医学价值。

另有部分儒生、经学家兼涉医书辨伪，如沈作喆《寓简·卷七》称《素问》文字多有讹脱；周辉引许志康辨《太素脉》；叶适《习学记言》辨《神农本草经》；魏了翁《鹤山集》疑《素问》为东汉后所撰；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主要采晁公武、陈振孙之说，将《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和《子午经》四部医书辨为伪书。

2.2 医家辨伪

医家群体对医书的辨伪，当首推元末医家吕复。吕复对《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脉诀》《脉经》《中藏经》《诸病源候论》《圣济经》等经典医籍进行评述，其评述中就包含多种医书的辨伪^[16]。吕复认为，《素问》“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17] 1208}，极有见地；《难经》“古有其书，而今亡之”^{[17] 1209}；《中藏经》为宋人依托华佗而作；《脉诀》为高阳生托名王叔和所作。吕复所论，皆是精辟之言。

除前述吕复、王好古、戴启宗外，另有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辨《耆婆五脏论》“妄托其

名于三藏佛”。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募原偶记》辨《素问遗篇》“要是系后人伪作”。元代滑寿《难经本义》辨《药注脉诀难经》托名张元素。元代王履《医经溯洄集》认为《伤寒论序例》为王叔和所作。元代杜思敬辑《济生拔萃》时，发现李东垣《活法机要》与张元素《洁古家珍》及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内容大同小异，对三书作者持怀疑态度，但未有明确结论。

北宋庆历以降，疑经辨伪成为学术主流，欧阳修、司马光等学者对传统经籍的质疑波及医学领域。理学兴起推动考据方法发展，目录学（如《郡斋读书志》）成为辨伪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工作最突出的就是综合性地运用辨伪方法，如晁公武、陈振孙等目录学家结合著录源流、文风对比、史实考证进行多维判断，文人儒生与医家共同参与辨伪，前者重文献考据，后者兼涉医理分析。吕复对《素问》“非一时之言”的论断，已触及古籍层累形成的本质。此外，如晁公武肯定《脉诀》的实用价值，体现辨伪与临床价值的分离，为明清“证真”思想埋下伏笔。此阶段辨伪从零散质疑转向系统考证，目录学、历史考证与医理分析的结合成为核心方法，奠定了中医辨伪的基本框架。

3 明清时期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

明清时期医学文献的增多、医书刊刻事业的繁荣，促使明清两代医学伪书增加，文人经史目录学家和医家两个辨伪的书目和方法各有侧重。

3.1 文人经史目录学家辨伪

明代文人经史目录学家的辨伪工作肇自宋濂。宋濂承宋元辨伪之风作《诸子辨》，为第一部辨伪专书，但《诸子辨》所涉中医伪书仅《素问》一部。“《素问》以为黄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脱营不医’之文，殊不知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18]，从侯、王二词为切入点，以史实为辨伪依据进行判断；又言“虽疑先秦之士，依仿而托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18]，充分肯定了《黄帝内经》为医家之宗的历史价值。而后郎瑛《七修类稿》从《素问》文风与《淮南子·鸿烈》篇相似，《素问》中芍药、麦等物候与《淮南子》中的“七十二候”相类，《素问》中罗裹雄黄、歃血等民俗非黄帝之时，从而判断《素问》为淮南王之作，注重从史实出发进行辨伪。明中后叶胡应麟《四部正讹》是第一部系统阐述辨伪学理论的专著，秉承

“求真”的辨伪思想，对古籍真伪进行定性（真伪疑、真伪错、真伪杂、伪中伪），总结 21 种伪书的类型，归纳辨伪八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四部正讹》共论 64 部古籍真伪，未专列医学古籍，但叙论、结论部分兼涉了中医古籍的辨伪。该书认为《素问》为“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20]，伊尹《汤液经》为“传古人之名而伪者”^[20]（作者按：《素问》《汤液经》是《四部正讹》二十一种伪书类型之二），并提出《素问》“其名讹也，其书非伪也”，首辨《素问》为“非伪”之书，首次在医学古籍辨伪领域进行“证真”。稍晚于胡应麟的焦竑，其笔记《焦氏笔乘》认同陶弘景、颜之推等人的观点，从《神农本草经》出现众多郡县判定其为伪。张燧《千百年眼》亦从此论。

清初学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是重要的辨伪专书，主要对《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外经》《灵枢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诀》六书进行辨伪，大体从著录、地名、词语、天文历法等方面进行考察。此外，姚际恒认为《伤寒论》《金匱玉函经》二书经王叔和整理，乃“真书杂以伪者”^[21]。清中期，章学诚《文史通义》认为《灵枢》《素问》《难经》为依托之书，乃复古尊经的产物，深中肯綮。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从序文所载年月、官职，结合《唐书》《宋史》等正史资料，判定《易筋经》《洗髓经》为伪书。孙星衍辑复《神农本草经》，在《校定神农本草经序》中指出，《神农本草经》与《素问》相同，都是后人托名之作。李筠嘉《慈云楼藏书志》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可能是朱震亨门生叶英托名之作。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在《慈云楼藏书志》基础上撰写而成，也涉及较多医书辨伪，其认为《难经》托名华佗，《海上方》托名孙思邈，《脉因证治》托名朱震亨，且可能是石门人望来苏所撰。另有袁枚《随园随笔》辨《神农本草经》为伪，崔述《考信录》辨《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为伪，但皆论之较简。

清代文人群体文献辨伪工作集大成者当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对 714 部（篇）文献的真伪问题进行探讨^[22]，其中对 25 部中医著作的真伪、作者进行探讨，具体见附表 1（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可见其辨伪内容相较前人有极大的扩充，涵盖医经、诊断、方药、房中、临证各科等，几乎涉及中医药的各个领域。

除文献辨伪外，部分著作还兼涉证真。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杜天师了证歌》进行辨伪，而钱曾《读书敏求记》则对该书进行证真，认为确

为杜光庭所撰。

3.2 医家辨伪

这一时期，医家群体的辨伪工作成果较多，众多名医均有关于医书真伪或作者的讨论，如杨继洲、徐春甫、李时珍、陆九芝、张山雷、王士雄等，同时代的日本医家丹波元简、丹波元胤、伊泽兰轩、望月三英等人也成果颇丰。在众多医家中，以曹禾《医学读书志》《医学读书附志》、陆九芝《世补斋医书》、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最为突出。明清时期医家群体（含日本医家）的辨伪书目和成果见附表2（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

相较而言，经史目录学家的辨伪方法大多依据传统文献学，侧重以目录学、文风、文本细节为依据。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虽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辨伪成果放在经史目录学家下进行考察，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官修著作，不少医家也都参与了《四库全书总目》及提要的编纂工作，因而可以发现，与其他经史目录学家相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辨伪工作无论是从书目、方法还是内容方面都远超其他。而医家群体，其辨伪方法则更侧重医理层面。如叶霖在《难经正义·序》中指出：“医书之繁，汗牛充栋，然剽袭伪托者多矣，何从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尔。辨之法有三：考其年以求其世；此后味其辞而索其旨之浅深；临其诊以证其言之是非，而真伪无所匿矣”^[23]，强调基于临床的辨伪方法。这一辨伪方法的转变，使得不少经史目录学家未关注的医书被纳入考察范畴。然而，由于医家对医书的研究旨趣更在于医理、方药和运用，因此他们关于医书辨伪的论述整体上相对简要。同时，以医理出发的辨伪难免存在门户之见的误判或胶柱鼓瑟于医理而不知变通。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清代对《伤寒论》持“错简重订”观点的诸多医家，凡是遇到医理、文句难以解释者，就责之王叔和伪托，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其本质“不过欲自以为道统耳”（《内科通论》）。又如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认为尤怡《金匱翼》与其《金匱心典》医理矛盾，怀疑是他人伪托。但二书只是侧重不同，一则重在释典，一则重在发挥。再如陆以湑《冷庐医话》，认为张子和为一代名医，但其《儒门事亲》全是攻邪之法，未有补虚，名医不当如此孟浪，从而判断是其门人麻知几伪托。另如，赵晴初疑对徐大椿的学术主张有门户之见，认为《洄溪医案》《慎疾刍言》皆为伪托之作。实际上，医家的学术观点和主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

医家可能有一些标新于当世的理论，如攻邪学说，不可以后世罕见或自己对该学说的偏好，而认为张子和这般名医不可能采用此法，从而判定《儒门事亲》为伪。因此，陈修园、陆以湑、赵晴初这三处的论断，都是草率且无实据的。

这一时期，考据学的鼎盛发展推动文献学理论化，胡应麟《四部正讹》提出“辨伪八法”，标志着辨伪成为独立学科。医学文献激增与书商伪作泛滥，促使辨伪需求进一步扩大。在辨伪方面主要体现出三重特点：一是理论的体系化。胡应麟将伪书类型细化为二十一种，提出“伪书非伪学”的辩证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官修权威整合前人成果，构建医籍辨伪的全面框架。二是医理的深度介入。医家群体从医理切入，如陆九芝以《儒门事亲》纯用攻邪否定其作者真实性，虽存门户之弊，却凸显医理辨伪的独特性。三是跨国的学术互动。如日本医家丹波元胤借鉴清儒方法，结合本土文献对诸书进行考辨。此阶段辨伪从文献表层考证深入到学术思想内核，但医家与文人儒生的方法论分野亦暴露单一视角的局限性。

4 民国时期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

4.1 文人经史目录学家辨伪

清中叶由庄存与兴起的“今文经学”在光绪年间达到高潮，其影响延续至民国。而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顾颉刚、钱玄同等“古史辨派”以“疑经辨伪”为指导思想，掀起“古史辨”运动（1926—1941）。古史辨派主要对经史典籍疑经辨伪，也兼涉医书的辨伪，但辨伪书目和前人类似，主要集中在《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早期医学典籍。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考诸子略以外之现存书》，认为《素问》是托名之作，应在邹衍之后，西汉以前成书。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认为《素问》出自六朝以后，《灵枢》为王冰伪造，《难经》为后人摭取《素问》《灵枢》而成。

除“今文经学”和“古史辨派”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民国时期目录学的集大成者，也涉及较多医书辨伪或关于医书作者的讨论。如其认为《难经》为齐梁间人伪作。通过审查文体，认为《龙树菩萨眼论》为隋唐之间成书，但充分肯定其价值，“古籍可珍，非后来者可依托也”。通过文本内容与文本对比，认为《徐灵胎医书后集八种》（《内经诠释》《脉学论》《脉诀启悟》《伤寒约编》《六经病解》《舌鉴总论》《杂病源》《女科医

案》) 为他人伪托。通过版式、纸张、刻工判断《明目良方》(原不撰名氏) 为明人所作。据著录、刊刻、版本认为《备急灸方》可能不是张焕之作。又如《囊秘喉书》, 旧题杨龙九撰, 书中未详白喉一症, 或成书较早, 但又引王士雄之方, 成书应在咸丰年以后。通过疾病史和方药细节, 最终判定可能是在民间铃医的秘方基础上多次增补而成。此外,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定的一些伪书则持中正态度, 如《傅青主女科》等争议著作, 保留通行署名, 体现“疑罪从无”的学术审慎。与前代辨伪相比,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持中立、客观的态度, 不似古史辨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对伪书的道德批判, 其提要的内容更侧重对作者、成书、学术观点的介绍, 并在辨伪方法上系统性引进版本学实证, 借助版式、刻工、纸张等文献版本学方法进行判断, 将辨伪从文本层面扩展至文献物质载体。

4.2 医家辨伪

这一时期, 医家群体的医书辨伪工作首推谢观, 其著作《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医籍大辞典》涉及较多辨伪内容。谢观认为《褚氏遗书》为唐末五代人伪托; 《黄帝虾蟆经》为汉代人伪托; 《咽喉脉证通论》为元明人伪托; 《医经原旨》为坊刻托名薛雪, 并引《吴医汇讲》中薛雪曾孙薛启的论述, 称“生白不屑以医见, 故无成书”; 《脉诀启悟》为书商托名徐大椿, 系摭拾张璐等之说而成; 《女科医案》托名徐大椿; 《慈幼新书》为程云鹏之作, 书贾托名张介宾; 据医理, 认为《叶氏眼科方》是托名叶桂之书; 《医衡》《傅青主男科》均为托名之作。但需要注意的是,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与吕思勉的《医籍知津》也存在署名和抄袭的争议^[24]。

除谢观外, 日本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对《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雷公炮炙论》等书著者都有精辟讨论。陆渊雷《金匱要略今释》则据《中藏经》的医理, 认为该书非汉代作品。王松如《温病正宗》沿袭前人观点, 认为叶桂《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景岳全书发挥》为顾景文等人伪托。《觉庐医话录存》认为《素问气宜保命集》为张元素著, 后人伪撰序文, 混入《伤寒六书》中托名刘完素。近代医药报刊上, 也涉及医书辨伪。如《神州国医学报》连载吴去疾的《去疾医话》, 吴去疾据年谱、序跋, 并进行文本对校, 认为陈修园《医医偶录》与江涵暾《笔花医镜》相

似, 疑非陈修园之作。

这一时期, 新文化运动催生“古史辨”学派, 顾颉刚“层累说”颠覆传统古史观, 文献辨伪成为显学。西学东渐下, 科学实证主义影响医学研究, 谢观等医家在这一浪潮下积极参与医书辨伪。但需注意的是, 古史辨派将《素问》《灵枢》纳入上古史重构体系, 似乎有在否定其托名黄帝的权威性, 引发中医经典合法性质疑, 导致部分经典价值被低估。

5 当代的中医古籍文献辨伪

1949 年以后, 中医文献辨伪工作承前余绪。此时期的辨伪工作主要可以分成两部分: 1) 谢仲墨与其中医文献辨伪专书《历代医书丛考》(1963 年), 该书堪称中医文献辨伪集大成之作, 也是迄今为止医史文献学界唯一一部辨伪专书。该书考证了 23 类 204 种医学文献 (含兽医类文献), 对大部分文献进行了辨伪, 对部分文献进行证真, 充分肯定了《小儿药证直诀》《金匱翼》《儒门事亲》《重楼玉钥》《徐批临证指南医案》等书不是伪书, 指出前代辨伪者以自己的中医学术主张来判别伪书的错误做法, 并主张《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不宜放入伪书范畴进行讨论。2) 以单篇的学术论文呈现的辨伪成果, 涉及医经、诊断、方药、伤寒、温病、临证各科、医案、针灸推拿、丛书、序跋等各种类型, 合计辨伪书四十余种, 其中有两书掀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一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否为陶弘景之作, 二是《傅青主女科》与陈士铎《辨证录》的署名归属问题。

此外, 其他文史著作也包含医籍辨伪, 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25] 对子部十余种中医伪书进行分析、邓瑞全与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26] 对子部二十余种医籍进行辨伪、郑良树《续伪书通考》^[27] 则对张心澂《伪书通考》的内容和书目进行了增补。另如中医目录书、中医辞典等工具书也兼涉医书辨伪, 如王重民《善本医籍经眼录》^[28] 对《东垣食物本草》《李时珍食物本草》《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女科百问》《产宝百问》《女科万金方》《女科百病问答》《新刊明目良方》等医籍进行辨伪, 另对《先醒斋笔记》等医籍进行证真。严世芸《中国医籍通考》^[29]、李茂如《历代史志书目医籍汇考》^[30]、王瑞祥《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31]、刘时觉《中国医籍补考》^[32] 与《中国医籍续考》^[33] 等, 或涉医书辨伪, 或汇编前人辨伪之论, 或存疑留目。另如在对医著进行校点时, 也注重考察伪书,

如《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明清名医丛书大成》系列丛书,对名医医著收录前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筛选辨伪工作。

6 小结

中医文献辨伪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是中医医史文献研究、中医各家学说研究乃至中医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步骤。以学术史研究为例,其是正确认识医家医著及其学术思想的前提,能避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如研究温病学术史,《证治心传》一书包含了吴有性、喻昌、叶桂等医家在内的温病学学术发展精华,其真伪不可不辨,若该书确为真,则既往许多温病学术研究的结论将被推翻。

伪书作为一种传统书刻行业里广泛存在的现象,不仅与书商的商业行为有关,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化特点。如早期医学文献,尤其是宋以前的医学文献,古人在著书时有明显“崇古尊经”的倾向,常托名黄帝、神农等上古神话人物或医和、医缓、扁鹊、华佗等古代名医。如《黄帝内经》等经典元典性文本的托名问题,既涉及医学权威建构,亦折射古代知识生产的“层累造成”。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囿于伪书“伪”这一字眼,而不自觉产生一种抵牾。实际上,伪书与伪学应当做明确区分:一是伪书不等于伪学。如《褚氏遗书》,虽多被视为伪书,但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论述尤为精到。二是伪书往往真伪互掺,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作者所在年代的医学文献,仍具有文献价值,如《西方子明堂灸经》就保存了《明堂灸经》中的文献。

中医古籍的辨伪工作,肇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至明清及近现代,已较为成熟。中医古籍文献辨伪从零散质疑到系统化理论的转型中,医家群体、文人群体利用不同的辨伪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医籍真伪、作者和内容进行讨论,极大促进了医学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我们在考察历代医书辨伪工作时发现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偏执一端,往往仅根据某一疑点就轻率定论,持“有罪推定”;二是门户之见,以自身学术观点作为评判标准。因此,文献辨伪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宁存其疑,亦不轻断。

晚近,一些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34],对传统文献单一的辨伪研究转向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对古书体例的研究、李零等提出的“古书年代学”^[35]研究。这种由粗到细、由点到面的学术研究转向,削减了传统文献辨伪侧重对古籍著者名实问题的探讨,强化了对文献年代、版本、成书、流

传、著者、体例、文本等的研究,是对文献更为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

中医文献的辨伪工作亦当如此。除谢仲墨外,尚未有对医书辨伪经验、方法、成果的系统性总结,应当先总结前人的医书辨伪方法和成果,继而转向对中医文献的“深度辨伪”。一是构建中医文献年代学体系,深入考察文献的成书情况及年代;二是整理辨伪个案的方法论遗产,提炼中医辨伪学的独特范式;三是推动深度辨伪研究,即从年代学、版本学、目录学、书籍史、文献溯源等角度进行深度研究,厘清文献间复杂的著者关系、引用关系、文本构成、学术观点,才能保障文献的真实与可靠,厘清中医理论的发展脉络,避免学术误导与资源浪费;四是融合出土文献与科技前沿的跨学科辨伪路径。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简帛医药文献的出土,不仅重构了早期医学史的认知,更弥合了传世文献的史料不足,为早期医籍的辨伪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兴起,通过神经网络建模、文本风格计量分析等技术,可实现对医籍用词、语法、文风的智能识别,推动辨伪方法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型。

参考文献

-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6.
- [2]司马朝军.文献辨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3.
- [3]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48.
- [4]孙灵芝.中医古籍伪书研究[J].中医文献杂志,2018,36(2):1-4.
- [5]褚澄.褚氏遗书[M]//严世芸,李其忠.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005.
- [6]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2.
- [7]曾贻芬.隋书经籍志校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499.
- [8]颜之推.颜氏家训[M].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71.
- [9]方春阳.高阳生并非六朝人[J].浙江中医杂志,2003,47(5):48.
- [10]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138.
- [11]崔锡章.《脉经》版本流传考略[J].北京中医药,1999,18(6):41-43.
- [12]张逸飞.从《郡斋读书志》医籍著录情况看北宋医学发展[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3,43(9):129-131.

- [13]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校证[M]. 孙猛, 校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4]于佳敏. 宋代书目医籍著录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 [15]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徐小蛮, 顾美华,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82.
- [16]李继明. 元代医家吕复及其在中医目录学上的贡献[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8, 21(1): 35-36.
- [17]戴良. 九灵山房集笺注[M]. 朱祖日,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 [18]宋濂. 诸子辨[M]//顾颉刚.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810.
- [19]李鹏. 《四部正讹》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8.
- [20]胡应麟. 四部正讹[M]//李敖. 国学精要(1).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 4.
- [21]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69.
- [22]佟大群.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 [23]叶霖. 难经正义[M]. 吴考槃,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5.
- [24]王珂. 必也正名乎: 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1(1): 57-64.
- [25]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6]邓瑞全, 王冠英. 中国伪书综考[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8.
- [27]郑良树. 续伪书通考[M]. 台北: 学生书局, 1984.
- [28]王重民. 善本医籍经眼录[M]//丁福保, 周云青. 四部总目医药编.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
- [29]严世芸. 中国医籍通考[M]. 上海: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93.
- [30]李茂如. 历代史志书目医籍汇考[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 [31]王瑞祥. 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 [32]刘时觉. 中国医籍补考[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 [33]刘时觉. 中国医籍续考[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 [34]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7.
- [35]李零. 李零自选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A Brief History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Authentic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WANG Juyi¹, WU Linna², LI Hongtao³

1.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2.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is paper summarizes 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critical methods. The work of identifying spurious texts in TCM literature be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eveloped further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and reached a relatively mature state in the Ming, Qing and modern periods.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criticism was mostly scattered skepticism.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under the intellectual trend of questioning classical canons, more comprehensive methods of textual criticism were appli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gnificant progress was made both in methodology and bibliographic studies, with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edical Reading Notes* (《医学读书志》), *Shibu Zhai Medical Books* (《世补斋医书》), and *Studies of China's Medical Books* (《中国医籍考》) as prominent examples.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e "Doubting Antiquity" movement brought textual criticism to the forefront of academic debate, represented by XIE Guan's *Treatises o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国医学源流论》) and *The Great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中国医籍大辞典》). In contemporary period, XIE Zhongmo's *Collected Studies on Medical Books Through the Ages* (《历代医书丛考》) stands as the first and only monograph dedicated specifically to authentication of medical texts, hold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While other verification findings mainly appear in academic papers. Textual criticism of TCM literature demands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bjectivity, and cautious judgment, aiming to rectify the sources, eliminate forgeries, and preserve authentic knowledge.

Keywords textual criticism;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Collected Studies on Medical Books Through the Ages* (《历代医书丛考》)

(收稿日期: 2025-06-25; 修回日期: 2025-08-18)

[编辑: 侯建春]